

摘要 20世纪50—80年代,岭南现代庭园建筑创作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获得全国园林与建筑界的一致好评。然而,岭南地区后来却再没有发展出具有同等影响力的、系统的创新园林理论。为解答这个问题,借鉴社会理论中“现代性现象”这一概念,将岭南现代庭园建筑师余峻南的论著《现代建筑及我国江南庭园空间组织问题的探讨》视作“现代性事件”,从三个结构层面探讨作品与现代社会各层面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岭南现代庭园设计理论虽然明显符合现代社会经验理性的知识观和新中国建设需求这两个结构层面的变化趋势,但在理念和情感上却始终脱离现代人审美的个体化趋向,因此缺乏理论创新的动力。

关键词 余峻南 岭南庭园 现代风景园林 现代性

ABSTRACT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80s, Lingnan modernist garden combined “tradition” with “modernity” and thus won unanimous praise throughout China. However, there was not any influential and systematic innovative theory developed in the Lingnan area after the 1980s.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reason, this article uses the notion of “modern phenomena” in social theory in the stud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Jiangnan Garden*, an article by Lingnan modern garden architect She Junnan, and finds that Lingnan modern garden design theory obviously conformed to the knowledge outlook of empirical rationality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 issues. However, it always divorced from the trend of aesthetic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individual mentality of modern people in terms of ideas and emotions, thus lacking the motivation for knowledge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She Junnan; Lingnan Garden;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odernity

DOI 10.12069/j.na.20230209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959(2023)02-0091-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108241)

王曲荷 林广思*

WANG Quhe LIN Guangsi

一个现代建筑与传统园林的现代事件

——关于《现代建筑及我国江南庭园空间组织问题的探讨》的研究

A Modern Even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Garden: Study on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Jiangnan Garden*

1 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民族国家刚刚建立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中国传统园林为对象的研究在借鉴西方现代建筑学视角下展开,并很快引发了国内创新性的园林理论研究与实践。“岭南庭园”在1962年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被构建^{[1]109},逐渐成为岭南地区传统园林和当时现代建筑庭园设计的集称,其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2],并引申出一些有关传统园林理论的讨论^[3]。但令人疑惑的是,岭南建筑师群体此后虽在园林与建筑结合方面有一些接续性的实践^[4],在设计思想与理论上却并没有更多创新性的发展,而是将重心逐渐转向了宏大叙事的“两观三性”建筑论^[4-5],也几乎没有参与此后国内园林史研究范式的变革^[6]与“造园建筑学”^{[7]174}等概念方法的提出。

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实质上是现代性的知识理念、政治制度等

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需要从现代性的宏观结构层面对此问题加以考虑。对中国1960年代以来整体的现代性问题进行研究的相

关理论或许可以提供更加合适的方法论指导。刘小枫在撰写于1980—1990年代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基于西方的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提出将至今仍在发生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8]视为“现代性现象”(moderne),而发生于这三者结构性位置之中的事件则被理解为“现代性事件”,现代学是作为关于现代性事件的知识学^[9]。受该理论启发,笔者认为,“岭南庭园”术语构建和发展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

综合上述思路,以下以一本于1962年由岭南重要建筑师余峻南撰写,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岭南庭园论著《现代建筑及我国江南庭

[作者单位] 王曲荷: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福州,350108)

林广思: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广州,510641)

*通讯作者(E-mail: asilin@126.com)



1 《现代建筑及我国江南庭园空间组织问题的探讨》1962年油印本封面与内页展示

园空间组织问题的探讨》²（以下简称《探讨》，图1）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现代事件”的三个结构层面，研究《探讨》一文与“现代”社会各层面之间的联系，理解其中的现代性特质，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究这些特点与岭南学派由庭园建筑理论向“两观三性”国家叙事的转向之间的联系，及其对当下传统庭园研究有何启发意义。

2 探究“空间组织”与“空间构图”的经验理性知识

1959年，余峻南赴上海参加建筑工程部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召开的“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会间不少建筑师发表了对中国传统园林与建筑空间的研究成果。会后，余峻南又与林克明一同到苏州、无锡考察学习了江南园林^{[10]53}。结合《探讨》中苏州园林的具体内容来看，此行应是触发《探讨》一文研究庭园的直接动因。此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对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探索投射在现代建筑设计领域中，体现为“古为今用”的时代需求和导向，这也成为余峻南投身中国传统园林研究并试图建立传统与现代之间知识联系的宏观背景。

在《探讨》开篇，余峻南清晰明确地提出了研究目的——“着重谈谈空间的艺术处理手法问题”（油印本第1页）；随后在有关江南庭园的内容中又提到“将江南庭园艺术运用到民用建筑中去”（第25页），并因此提出创造意境、对景、借景、控制欣赏点、把握尺度、对比等具体方法。从“现代建筑及我国江南庭园空间组织问题的探讨”这一题目开始，余峻南就直接将“庭园”纳入“空间组织”的内容框架之下；而在具体内容中，“空间组织”又在“空间构图”的相关原则下得到进一步解释。“空间构图”作为建筑设计分析和创作的方法被不少接受西方建筑学教育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引入中国，在“古为今用”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中国传

统园林研究中一个全新且十分重要的角度^[11]。

这无疑是一次知识转换的过程，在现代学科教育中似乎显得稀松平常。然而300多年前，郑元勋在《园冶》的题词中却认为“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显然，在古人眼中，园林是“不可得而传”之技。因此，值得探究的是，前述知识转换背后有着怎样的观念支持？余峻南虽然没有出国接受西方现代建筑学教育的经历，但曾于1939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学习建筑工程，师从留美归来的林炳贤（1901—1986年），1951年后又在林克明（1900—1999年）的带领下开始岭南现代建筑创作^{[10]15-17}。现代建筑教育与实践所提供的一系列理论体系正是余峻南建筑设计之初最重要的设计思想来源，为余峻南从现代“空间组织”概念开始研究江南庭园提供了基础。

构图原理等现代建筑理论中的理性分析方法，是近代科学的产物。正如约翰·哈伯森（John F. Harbeson）在《建筑设计学习》（*The Stud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中所说，布扎体系的目的是传授给每个学生“处理和学习任何建筑设计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一套方法”^[12]。余峻南撰写《探讨》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够通过“空间构图”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园林中的艺术处理手法问题进行解释。以下以中国传统园林中最难以言传的“意境”为例进行详述。

“江南庭园在组织空间还要求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对自然的感受在‘意境’的再创造中隐约地曲折地流露出来，它很强调诗情画意在‘意境创造中’的重要意义。‘画意’主要是决定于风景构图的美好，关键在于如何把自然原有的东西，通过建筑位置的安排、经营和建筑物本身的空间构图，统一在一系列的宾主分明有联贯性的画面中，这画面是动态的，随时变幻的予人以一种仿佛置身其中的感受，这也就是‘景’。‘景’就是指那些重要建

筑群连同四周的自然风光有恰如其分的富有诗意的命名。（‘恰如其分’是正确掌握分寸的问题，这是建筑创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这种富有诗情画意的‘景’易于使人触景生情，从一个空间联想到另一个空间……”（第26页）

为了能够用空间组织的方法来解释意境，余峻南通过一系列语义的推进，首先将“意境”消解为具有“重要意义”的“画意”，进而解释为“空间联想”和“风景构图的美好”，最终又落实到意境最小的组成单元——“景”。这与同时期冯纪忠的“组景”研究及夏昌世和莫伯治的《中国古代造园与组景》（1961年）采用了相同的分析单元³，但相比较而言其更加重视“赏景”而非“组景”。接着，他在后文提出“打破传统惯例，不受法则的约束，灵巧地运用法则从事美的创作……法则是人在创作实践中的总结……人要在实践中逐步使自己的主观与客观趋于一致”（第31页），这包含着对普适的视觉经验法则的肯定，和对个人主观情感知识的理性转化。彭一刚在《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前言中对这类方法进行了解释，“现代建筑理论中的分析方法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存在本质区别，稍有不慎就很可能生搬硬套，分析的目的不在囿于造园者的创作意图，而在于解释造园的普遍原则以便指导设计”^{[13]2-3}，意在指出这类方法的应用范畴。从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知识类型论的知识观层面来看⁴，余峻南对“意境”的解构与彭一刚对造园普遍原则的总结均属于宰制知识或成效知识，“目的都在于找出自然、历史和社会的法则，以便驾驭它们”；这些知识也就是现代性知识理念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实证的经验理性知识”^{[14]53}。

20世纪初，在中国直面“现代”世界，寻求民族自信的浪潮中，岭南学派建筑师却首先因为造价高昂、施工复杂等问题开始反对大屋顶的民族样式，并向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寻求理论支持。1933年，林克明在《什么是摩登建筑》一文中认为“……故一切构造形式，完全根据现代社会之需要而成立”；1935年，勤勤大学建筑工程系教育成果展览会上，“科学性、时代性、务实性、实用性”被提出，视现代主义建筑为科学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15]168}；之后的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水产馆（1951年建成）完全呈现出现代建筑风格；以上皆从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原则出发对现代主义设计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体现了理性和实用等普遍原理对岭南现代建筑发展的深刻影响。

《探讨》中应用流动空间、空间尺度等“普适性”科学理论进行的分析论证，是以现代语境中更具普世价值、更加有效的语言去挖掘传统园林中“极其丰富，极其珍贵的财产”（第31页），用以

说明“东方庭园手法在建筑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西方建筑师的重视”(第20页),并认为“与其说现代建筑在组织空间方面深受东方庭园设计影响,还不如说受我国庭园艺术影响更为确切”(第21-22页)。这种做法是通过现代知识理念的转换回应其时“古为今用”和增强民族自信的时代命题。

3 满足“适用、经济、美观”的国家层面建设需求

源于现代建筑学教育的“风格—方法”转型,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成为岭南现代建筑创作重要的现代性精神之一^{[16]8-11}。1959年,在余峻南参加的“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上,刘秀峰作了题为“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报告^[17]。1961年,广东省建筑学会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讨论“南方建筑风格”。联系以上两个事件,可以发现“轻巧通透”等“南方建筑风格”是在贯彻“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方针前提下,包含在“大风格”内的“小风格”,是一种集体而非个人创作原则^[18]。在此基础上,夏昌世于1963年正式提出“岭南庭园”和“岭南建筑”的术语^{[11]109}。尽管广州与国家政治中心相去甚远,但由于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采用了卢梭的“人民民主”方案,加上新中国建设初期对经济和物质“现代化”的憧憬,再结合余峻南官方建筑师的身份和后期业界对其代表作之一广州友谊剧院的相关评论⁵,可以认为余峻南在1962年撰写《探讨》时对传统园林的研究并不只是如他本人所说的解决“艺术处理手法问题”(第1页),而是在综合回应适用、经济、美观的国家建设方针。以至《探讨》中对于江南庭园的空间构图手法并不是首先被抽象为特定规则,而是直接通过“问题预设—找到对应的答案”这一方式转化成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以《探讨》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江南庭园是如何突破空间局限的?”为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能看到余峻南怀揣这一问题,在留园中游走,于曲溪楼前发现“设计手法的特点,是在最小的建筑空间里把房子外表装成很大的样子”(第34页),在冠云楼、留园与青畅园中看到“宁愿放弃个体建筑屋面的完整性以保持建筑空间构图的完整性”(第33-34页),在小空间里获得了尽量大的建筑前空间体积(图2)。随后,他在讨论如何组织庭园空间时也有提到,用廊连接分散的建筑虽然“有利于组织庭园空间,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还是不合称的”(第50页)。这说明他认为对突破空间局限的重视不仅仅与创造“意境”有关,更是对节约建筑面积和造价等实际问题的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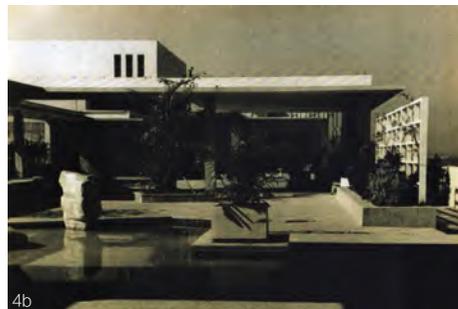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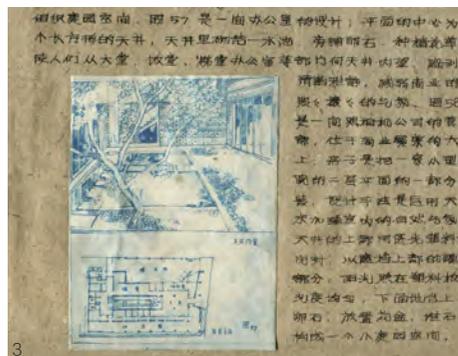
此外,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字里行间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现场感。例如他针对“如何将建筑与庭园结合”的设问做出了如下回答:“如广州市南方戏院的休息小园子,虽然陈设简陋,布局未达理想,但对于观众在中场休息、闲谈散步、恢复疲劳缓和紧张情绪,作用很大,也体现了南方戏院的特点。又如珠江宾馆、迎宾馆四号楼等建筑的天台花园,越秀宾馆的架空走廊把内院外院空间联系,这些处理手法都是不错……”(第42页),认为在平面布局天井“不但可以解决通风采光而且可以把建筑与庭园好好地结合”(第42-43页,图3)。这些“现场问答”中的思考都可以在余峻南主持设计并建成的广州友谊剧院(1965年)和广州东方宾馆新楼天台花园(1972年)中找到具体应用的场景(图4)。

因此,可以认为余峻南在撰写《探讨》时,从国家问题出发,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试图通过图文分析对设计实践进行指导。相比于同时期的童雋和刘敦桢,或是在传统园林研究方面有着诸多论著且相互间交流甚为密切的岭南建筑师夏昌世、莫伯治等人更加“科学”、系统的园林史研究和建筑理论构建,将《探讨》视为直接展现余峻南本人设计问题预设和思维过程的案例研究更为准确。如此一来,余峻南在《探讨》中展现出的形象全然是—一个关注实践的建筑师,而丝毫没有理论学者或是文人的气质。究其原因,应是建筑工程专业出身使余峻南形成了注重实践的个人观念;此外,其身边大多是具有工程背景的岭南学派建筑师,也对其思想观念有一定影响。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一现象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导致国家及地方对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实干型建设技术人才大量需求的直接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适用、经济、美观”的国家层面的建设方针导向。

在写完《探讨》两年后的1964年底,余峻南开始主持设计广州友谊剧院。1965年8月,该剧院建成,很快便得到了众多关注,被评价为“打破了过去严谨、对称的一贯做法,结合南方特点,巧妙地把中国园林的剔透玲珑和现代建筑的流畅明快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简化装饰,注重经济”^[19]，“针对‘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设方针做了非常突出的回应与阐释”^{[20]101},等等。余峻南本人也以“低造价能否做出高质量的设计”为题撰写了广州友谊剧院的设计经验总结^[21]。可以认为,由于《探讨》与国家建设方针和快速建设的需求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其中关于地域性、现代性、个人化艺术思想表达等方面受到部分抑制,虽有所涉但并未成为理论及相关实践的主题。

然而,当广州友谊剧院作为满足国家层面建设需求的优秀案例而被全国各地的建筑师争相模仿时,一

- 2 关于留园曲溪楼不对称构图的手绘图与分析(第34页)
- 3 关于天井的手绘图与分析(第43页)
- 4 余峻南设计作品
 - a 广州友谊剧院(1965年)
 - b 广州东方宾馆新楼天台花园(1972年)



如余峻南无法通过空间与构图的分析方法理解传统造园的意图,建筑师创作过程中的问题意识也不一定被各地的建筑师们所完全理解⁶⁾,这便造成了“传统园林结合现代建筑”作为一种形式标签传播开来,以致后期甚至出现了照抄形式而不关注具体问题的情况^{[2]82}。

4 为“人民群众”设计与个体感觉间的矛盾

为“人民”做设计,学习“人民”的智慧这类话语在《探讨》中不时出现,“……江南庭园艺术掌握了这些特点,并以此作为造景的题材,这也充分体现我国人民对艺术的修养和运用庭园艺术的精湛成就”(第26-27页),“……学习和掌握我国庭园空间组织的进展技术运用到设计具体工作中去,我们的设计质量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提高,更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第51页)。看起来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精神的直接体现,但若从现代个体向群体心性结构转变的视角看,不同的使用者设定为西方现代建筑与园林、岭南现代庭园建筑、中国传统园林之间的差异比较提供了一个基点。

马克·特雷布(Marc Treib)总结的现代风景园林原则中有“风景园林是为人设计的”这一条^{[22]55}。而余峻南包括《探讨》在内的多篇文章也都提到对人的重视,例如“建筑是为人,空间是为人,人是万物的尺度”^{[23]32}。看起来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重合,也符合人们对园林现代性的认知。但如果进一步分辨,可以发现马克·特雷布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同时也被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问题,即现代园林是为哪些特定人群设计的,并将其与埃克博(Garrett Eckbo)展现“民主”观念的“每个花园都是一个舞台,每个居住者都是表演者”的论述联系起来^{[22]55}。对于丘奇(Thomas Church)、唐纳德(Christopher Tunnard)、埃克博等美国第一代现代风景园林师来说,以现代私人住宅或特定社区的花园^{[24]92-144[25]53-83}作为主要对象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具有明显的个性化倾向,埃克博的“民主”也并非余峻南在《探讨》中对使用者和创造者的设定——群体性的“人民”。或者说,余峻南在“社会主义设计思想‘对人关怀’指导之下”(第42页),对公共建筑设计过程中使用者的设定必是以群体形象出现的,而对个体使用者的关注则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压抑⁷⁾。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60—1980年代长期主管广州城市建设的林西及岭南现代建筑和庭园的杰出设计师莫伯治身上;而同时代的冯纪忠在建筑和园林设计中致力于

在环境中表达个人性情的理念则与之截然不同^[26]。

郑元勋在《园冶》中对“不可传”做出的进一步解释是:“然予终恨无否之智巧不可传,而可传者只其成法,犹之乎未传也”。郑元勋在此没有全部否认“可传”,而是分为可传的“成法”和不可传的“智巧”两部分。这里的园林又在以传统设计者(如文徵明)个体的独特经验为载体的诗情画意与物态的循环叠加中获得了最终的精确性^[27]。这种精确性即是“智巧”,这里的“人”是具体的、有姓名的某个人,是计成,是郑元勋,是文徵明。

而余峻南撰写的《探讨》,由于从国家问题出发,并以群体的“现代社会需求”为实践原则,设计者个人作为融入群体之中的“看不见”的存在,最终提供了一个解决普遍性问题的答案,从而忽视了个体感觉与经验理性之间的矛盾,也就缺少对知识观和世界观反思的内在动力。虽然余峻南在《探讨》中也赞同使用“清奇淡雅”“深幽曲折”“声色香光”(第29页)等感性的文字进行描述,但他仍主要以“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在普遍的经验理性原则上进行讨论^[28],如宏观地提出“人爱动态”等等^{[23]33};他始终围绕气候适应性、地方风格等问题来探讨岭南庭园与江南园林的差异,因此也就难以触碰到对传统园林造园者个体独特经验之下意图的考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探索的价值与此后中国传统园林在个性化审美和中国传统文人世界观知识层面上对现代建筑学发挥的推动作用不尽相同,一如“客观的当代设计无法继承主观的古典园林”^[2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符合国家或群体问题意识的“两观三性”在价值观层面构建了新的建筑理论话语之后,岭南庭园理论却没能得到进一步深化,而在风景园林领域除了岭南园林史的相关研究得到推动之外,再无新的地域性建筑或园林理论产生持续影响力。

历史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认为,作为欧洲思想主要理念资源之一的希腊精神以“审美-知识学”行为为特质。二者构成互补的思想结构要素:知识学欲求理念和实体等确定的东西,审美欲求感性、流逝性等不确定的东西^{[14]123-124}。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性化与多元化、个性化并存,而且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诞生以来,代表人物尼采、福柯等人的理论都主张身体欲望的主导性,感觉的个体化和形式的破碎使得审美上越来越难以达成群体共识,同时,理性化、确定性的东西在不断消逝。与此相类,中国传统园林尤其是江南文人园的特质,决定了它可以

只是个人化、感觉化的,与个体的直接体验相关,而不受固定的经验理性原则制约,一如童寓所言“因为决定的因素是寻求悠闲而不是理性”^{[30]3}。这一审美倾向使得挑战和回应现代园林和建筑设计理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科学世界观成为可能,也难怪中国建筑师们能够迅速在中国传统园林中发现其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相契合的相关概念^{[2]80}。

20世纪80年代前后,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已影响了人文学科的大部分领域,并在中国建筑与园林领域内传播开来,促使中国传统园林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发生巨大转变^[31]。冯纪忠对“旷”“奥”的理解^[32]、王澍的造园建筑学的提出^{[7]175}、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和冯仕达(Stanislaus Fung)对园林史研究范式变革的推动^[33],以及杨锐“境”理论的提出^[34],等等,无论其是否受到相关理论直接影响,它们都可以被认为是旨在树立一种新的、区别于自然科学世界观预设的系统性知识;这类新的知识在舍勒那里属于“本质知识或教养知识”,均能通过本质直观先验地获得^{[14]53-55}。因此,中国传统园林的个体感性部分非但没有遭到否定,还逐渐被强调,从而拓展了中国现代建筑与园林理论发展的思路。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感受与经验理性之间的张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现代建筑发展的动力来源,而中国传统园林之所以能与这一张力之间产生深刻互动,要归因于其在这套动力系统本身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5 结论

余峻南在1962年写下《探讨》一文,其中的现代性意涵体现在现代世界与建筑师个体的、偶然的经验的交织当中:①经验理性,即运用“空间构图”等现代自然科学世界观预设下的经验理性知识进行“古为今用”的理论研究与设计;②新中国建设需求,即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国家政治-经济为中心的问题意识和实践观。其后,余峻南以官方建筑师身份进行了一系列广受好评的公共文化建筑、驻外使馆、接待外宾的宾馆建筑创作,以上两个特点得到不断强化。

而从现代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层面来看,个体感觉与经验理性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风景园林与建筑发展中很重要的推动力。中国传统园林在现代建筑演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正是对这一矛盾中个体感觉的回应,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对新的世界观知识的考察,推动了学科思维方式的创新转变;而这一点在《探讨》或是余峻南后期的论著中都没有

得到明确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岭南学派没能在庭园理论方向上继续深入下去，或许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家或群体意识（“两观三性”建筑论）与经验理性（普适的现代主义）之间的相互促进掩盖了个体感觉与经验理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现代建筑创作和岭南现代园林设计的思想创新。而在传统园林的框架之外，岭南现代风景园林开始探索新乡土与地域表达方式，例如提出“方言景观”^[35]等概念，为岭南园林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和可能性。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从学科新知识的产生到系统性理论与实践修正的过程复杂且无法预测。在建筑和风景园林学科中，这类良性循环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对现代人居环境科学及相关学科的实证研究进行提炼，并结合学科教育改革等理性方法进行运用与尝试；另一方面也需要与“审美化”表达互补的另一种感性，即《探讨》一文中展现出设计师的理性精神、现场感以及于实践中探索的社会责任感等等。鉴于此，反思“岭南庭园”^⑧理论建构的历程也成为建构岭南地区乃至中国的风景区园林学科发展新模式^[36-37]的重要基础。□

图片来源：图4a引自石安海主编，《岭南近现代优秀建筑：1949—1990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第216页；图4b引自余峻南著，曾昭奋主编，《余峻南选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第58页；其余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注释

- ① 如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2003年）、何镜堂院士工作室（2004/2014年）等建筑实践。
- ② 文中用于分析的《探讨》一文版本为藏于广州市设计院的1962年油印本，由作者于2019年拍摄、扫描。
- ③ 冯纪忠先生的研究参见：冯纪忠，《组景漫笔》，见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学术委员会，《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1980年，第2页；冯纪忠，《组景刍议》，《同济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第1-5页。夏昌世和莫伯治在《中国古代造园与组景》开篇提出，“中国造园艺术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探讨：一方面是以建筑空间关系为线索；另一方面是以风景线组织为内容，这就是造园的组景问题。”具体而言，组景的内涵是“围绕一个主题为内容，组织景物于一个空间中的组景手法”。详见：夏昌世、莫伯治，《中国古代造园与组景》，见莫伯治，《莫伯治文集》，广东科技出版社，2003年，第26-41页。
- ④ 马克思·舍勒（1874—1928年）提出人能拥有三种知识：宰制知识或成效知识（das Herrschafts- oder Leistungswissen）、本质知识或教化知识（das Wesens- oder Bildungswissen），以及形而上学知识或救赎知识（das metaphysische oder

Erlösungswissen）。参见：舍勒，《哲学与世界观》，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 ⑤ 吴良镛院士曾高度评价友谊剧院：“建立在中国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巧妙地利用南方气候的特点，从祖国岭南园林文化遗产中，找到一条新的，以‘虚’代‘实’，室内外空间相结合，体现时代要求的新建筑创造道路。”参见：吴良镛，《大师风范，气含秋水》，见曾昭奋，《余峻南选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年，第21-23页。
- ⑥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探讨》为广州市设计院内部交流学习的资料，之后文革时期又遭批判，因此传播范围不会很广；另一方面，余峻南在《低造价能否做出高质量的设计——谈广州友谊剧院设计》里提到，在接到友谊剧院设计任务后“又出去参观学习，归来后同样是把人家的设计图纸改头换面地搬过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全国各地建筑师做设计时常相互学习和模仿的现实状况。
- ⑦ 在《我的建筑观——建筑是为“人”而不是为“物”》中，余峻南特别将“人”与“我”二者分开；在《宁可无得，不可无德：与青年同学漫谈“建筑为人哲理”》等文章里，余峻南虽强调建筑师个人的修养，但重点在于为“人民”设计及创新精神，也未涉及个性化的感受与体验。参见：余峻南，《宁可无得，不可无德：与青年同学漫谈“建筑为人哲理”》，见《南方建筑》，1995年第3期，第45-46页。
- ⑧ 此处沿用夏昌世先生提出的“岭南庭园”概念和《岭南庭园》一书的表述，具有特殊意义，包含但又不仅仅是现代庭园理论。

参考文献

- [1] 林广思. 岭南现代风景园林奠基人：夏昌世[J]. 中国园林, 2014, 30(8): 108-111.
- [2] 周鸣浩. 创作中介与审美体验：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建筑关于继承园林传统的探索[J]. 建筑师, 2014(5): 79-87.
- [3] 林广思, 雷可心. 夏昌世和莫伯治的庭园理论分析[J]. 建筑师, 2020(2): 106-114.
- [4] 何镜堂. 基于“两观三性”的建筑创作理论与实践[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40(10): 12-19.
- [5] 冯江. 归乡：从夏昌世到何镜堂的建筑路途与理念嬗递[J]. 城市环境设计, 2018, 112(2): 40-45.
- [6] 周向频, 陈喆华. 史学流变下的中国园林史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4): 113-118.
- [7] 王澍. 造园与造人[J]. 建筑师, 2007(2): 174-175.
- [8]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9] 刘小枫. 现代学的问题意识[J]. 读书, 1994(5): 120-124.
- [10] 郑淑浩. 余峻南建筑美学思想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6.
- [11] 闵昆, 卢永毅. “空间构图”中国现代建筑“空间”话语的一个重要概念[J]. 时代建筑, 2013(6): 118-124.
- [12] 卢永毅. 谭垣的建筑设计教学以及对“布扎”体系的再认识[J]. 南方建筑, 2011(4): 23-27.
- [13] 彭一刚. 中国古典园林分析[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 [14] 刘小枫.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5] 王河. 岭南建筑学派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 [16] 肖毅强. 岭南现代建筑创作的“现代性”思考[J]. 新建筑, 2008(5): 8-11.
- [17] 刘秀峰. 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J]. 建筑学报, 1959(S1): 3-12.
- [18] 林克明. 关于建筑风格的几个问题：在“南方建筑风格”座谈会上的综合发言[J]. 建筑学报, 1961(8): 1-4.
- [19] 刘沪生. 试评我国近期剧场建设中的一些问题[J]. 建筑学报, 1982(8): 57-63.
- [20] 旅馆及影剧院建筑学术论文集[M]. 西南地区建筑设计标准办公室，1980.
- [21] 余峻南. 低造价能否做出高质量的设计？：谈广州友谊剧院设计[J]. 建筑学报, 1980(3): 16-19.
- [22] TREIB M.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review[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 [23] 余峻南. 我的建筑观：建筑是为“人”而不是为“物”[J]. 建筑学报, 1996(7): 32-36.
- [24] 沃克, 西莫. 看不见的花园：探寻美国景观的现代主义[M]. 王健, 王向荣, 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 [25] 王向荣, 林箐. 西方现代景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 [26] 林广思. 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园林营造：以华东、华南两地为例[J]. 文艺研究, 2016(11): 122-131.
- [27] 董明. 建筑学视角下的江南园林构成一种反图解的立场[J]. 时代建筑, 2018(4): 6-13.
- [28] 林广思, 王曲荷, 汪礼文. 余峻南庭园创作思想演变及其社会情境分析[J]. 新建筑, 2020(1): 13-18.
- [29] 俞挺. 必须主观：客观的当代设计无法继承主观的古典园林[J]. 时代建筑, 2018(4): 50.
- [30] 董雋. 论园[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 [31] 鲁安东. 迷失翻译间：现代话语中的中国园林[C]//卡森斯, 陈薇. 建筑研究01：词语、建筑图、图.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47-80.
- [32] 冯纪忠. 组景刍议[J]. 同济大学学报, 1979(4): 1-5.
- [33] 顾凯. 范式的变革：读《多视角下的园林史学》[J]. 风景园林, 2008(4): 117-118.
- [34] 杨锐. 论“境”与“境其地”[J]. 中国园林, 2014, 30(6): 5-11.
- [35] 庞伟. 方言景观：重新发现大地[J]. 城市环境设计, 2007(6): 15-16.
- [36] 林广思, 王曲荷. 通时合变，学必致用：华南理工大学风景园林学科源流与特色[J]. 世界建筑, 2018(5): 109-112.
- [37] 林广思. 论我国风景园林学科划分与专业设置的改革方案[J]. 中国园林, 2008(9): 56-63.

收稿日期 2021-03-16

编辑：方盈